

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丛书



汉魏六朝文体与文化研究

何诗海 著

汉魏六朝

Hanw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丛书

汉魏六朝文体与文化研究

Hanwei Liuchao Wenti Yu Wenhua Yanjiu

何诗海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魏六朝文体与文化研究/何诗海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7
(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丛书)

ISBN 978-7-301-19002-9

I. ①汉… II. ①何… III. ①中国文学-文学研究-中国-汉代
②中国文学-文学研究-中国-魏晋南北朝时代 IV. ①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11211 号

书 名: 汉魏六朝文体与文化研究

著作责任者: 何诗海 著

责任编辑: 徐丹丽

封面设计: 奇文云海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9002-9/I·2348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22
出版部 62754962

电子邮箱: pkuswsz@yahoo.com.cn

印刷者: 三河市欣欣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965 毫米×1300 毫米 16 开本 19.25 印张 268 千字

2011 年 7 月第 1 版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8.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总 序

在中国著名的综合性大学中,中国古代文学这个传统学科都堪称历史悠久、积淀深厚。中山大学的古代文学学科也不例外——她的历史与孙中山先生所创立的中山大学(初名广东大学)同样悠久。鲁迅、郭沫若、陈中凡、方孝岳、容庚、商承祚、詹安泰、董每戡、王起等名字让我们回忆起来充满着自豪感。

然而,对后人来说,学科辉煌的历史与丰富的遗产同时也是压力。我们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固然占了“便宜”,但也像是站在海拔极高之处,每一步攀升都异常艰难。仰望前辈,如何既继承学术传统又有所发展,是我们一直思考的问题。

当今,“独创”二字已经成为各个社会阶层的流行语。不过,各个领域不同,不同学科有异:有些贵在创造发明,有些偏重发掘发现。有些可能是“独创”,有些则只能是“独特”。对于人文学者来说,我们似乎难以创造发明自诩;形态上的“新”与“旧”也难以用来判断学术价值的高下。所谓“创新”,未必意味着对于传统的抛弃。按照清代学者纪昀评点《文心雕龙》的说法,在历代文坛上,“新声”可能成为“滥调”,“旧式”也可能成为“新声”。新与旧不是绝对的,是会互相转化的。在传统断裂的时代,挖掘与发现传统文化资源,也是颇有价值的事。

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文体学就是传统的学术资源。“以文体为先”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的传统与原则。中国文体学成熟相当早,《文心雕龙》在文体学方面已经相当精深而自有体系,此后的文体学可谓久盛不衰。但近代以来,西学东渐,中国文体学日益式微,甚至被人所淡忘。从20世纪80年代起,在新的学术观念推动下,文体学研究成为

古代文学研究的新视角之一。近年来,文体学研究更是越来越受到中国文学学术界的重视,成为一个极具研究价值的前沿学术领域和备受关注的学术热点。

尊重古代文学的历史事实,回到文体的历史语境,将文学观念和理论建筑在具体文学史实之上,以中国“文章学”的观念来“发现”、诠释和演绎中国文学自己的历史,尽可能消解自新文化运动以来套用西方文学分类法研究中国传统文学造成的流弊——这是近年来中国文学研究源于自身需要与反思所形成的重要发展趋势,也是中国文体学兴盛的背景。这一兴盛具有丰富的学术史意义,它标志着古代文学学术界的两个回归:一个是对中国本土文学理论传统的回归;一个是对古代文学本体的回归。

回归本土与本体,并不意味着满足于回归到“旧式”那里去。我们强调回归到中国文化与文学的原始语境与内在脉络,同时又不能也不可能排除现代意识。西哲曾云:“人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虽然,中国文体学之复兴,为“古人之旧式,转属新声”,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种作为“新声”的“旧式”已经完全不可能与古代的文体学相同。我们要站在21世纪的学术高度来研究中国文体学,回到中国文体的历史语境,但又不仅仅是要回到刘勰等古人的理论,同时必须具有当代的学术意识,反映出当代的学术眼光、学术水平与境界。

作为国家级重点学科,中山大学古代文学学科必须有自己鲜明的特色,有受到学界认可的学科方向。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就是近年来我们凝聚力量、重点建设的研究方向。经过多年的努力,它已经成为本学科影响最大的方向之一。同仁们在古代文体学研究方面成果丰硕,除了发表了大量论文之外,还撰写了不少专著,同时,也承担了一系列国家级和省部级科研项目,尤其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文体学发展史”,为了及时反映这些研究成果,我们组织出版这套“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丛书。

本丛书是开放与持续的。作者除了中山大学古代文学学科的教师，还有其他高校教师与学界同仁。所收成果以中国文体学研究为重点，兼及相关领域的研究。我们希望能不断地吸收中国文体学研究成果到本丛书中来，共同推进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的发展。

吴承学

2010年12月于康乐园郁文堂

序

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的源头,也许可以追溯到《周礼·春官·大祝》中关于大祝“作六辞以通上下亲疏远近”的记载。所谓“六辞”,指的是辞、命、诰、会、祷和谏六种不同的文体。《诗·邶风·定之方中》“卜云其吉,终然允臧”毛传曰:“建国必卜之,故建邦能命龟,田能施命,作器能铭,使能造命,升高能赋,师旅能誓,山川能说,丧记能谏,祭祀能语,君子能此九者,可谓有德音,可以为大夫”,也提到卜、誓、铭、说等多种文体。由班固在刘向、刘歆的《别录》和《七略》基础上撰成的《汉书·艺文志》,其中的《诗赋略》辨别赋体、载录歌诗,已有辨体的意识。东汉末蔡邕作《独断》,将“通上下”的应用文分为策制诏诫和章表奏议两大类,并分别加以阐释,大概可以算是最早的文体研究了。到了魏晋南北朝,随着文学创作的发展繁荣,作为这一时期文学理论和批评的一个重要方面的文体学研究也日益发展繁荣起来,在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挚虞《文章流别论》、刘勰《文心雕龙》、萧统《文选》和任昉《文章缘起》等重要文学理论著作中,都有大量的文体学论述。至于南北朝以后,就更不用说了。

在魏晋南北朝的文论著作中,刘勰《文心雕龙》对文体的讨论无疑最为深湛。其书五十篇,专论各种文体的,自《明诗》至《书记》,即占二十篇。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刘勰论述文体的方法,即“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文心雕龙·序志》)。史与论、创作与理念相结合,颇为周密,至今仍对我们的研究具有启发意义。刘勰论文体,主张宗经,他说:“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纪、传、

盟、檄,则《春秋》为根;并穷高以树表,极远以启疆;所以百家腾跃,终入环内者也。若稟经以制式,酌《雅》以富言,是即山而铸铜,煮海而为盐也。故文能宗经,体有六义: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贞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扬子比雕玉以作器,谓五经之含文也。”(《文心雕龙·宗经》)他认为“五经”是各类文章的源头,文章创作以儒家经典为楷模,才能达到“体有六义”的要求。他这里所谓“体”,若参之以《文心雕龙·附会》篇中的说法:“夫才童学文,宜正体制:必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辞采为肌肤,官商为声气,然后品藻玄黄,摘振金玉,献可替否,以裁厥中,斯缀思之恒数也。”则“体有六义”和“宜正体制”的“体”,实是文章创作应追求的一种理想的境界;而“体约而不芜”的“体”,则近于体裁、体式和结构。可见“体”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概念。

以“五经”为文章之源,其后承刘勰之说者甚多,而又以清人章学诚所论为最要。章氏以为,后世之文,“其源皆出于六艺”,“多出于《诗》教”。“战国者,纵横之世也。纵横之学,本于古者行人之官。观春秋之辞命,列国大夫聘问诸侯,出使专对,盖欲文其言以达旨而已。至战国而抵掌揣摩,腾说以取富贵,其辞敷张而扬厉,变其本而加恢奇焉。不可谓非行人辞命之极也。孔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是则比兴之旨,讽喻之义,固行人之所肆也。纵横者流,推而衍之,是以能委折而入情,微婉而善讽也。九流之学,承官曲于六典,虽或原于《书》、《易》、《春秋》,其质多本于《礼》教,为其体之有所该也。及其出而用世,必兼纵横,所以文其质也。古之文质合于一,至战国而各具之。质,当其用也,必兼纵横之辞以文之,周衰文弊之效也。故曰:战国者,纵横之世也。后世之文,其体皆备于战国。何谓也?曰:子、史衰而文集之体盛,著作衰而辞章之学兴。文集者,辞章不专家,而萃聚文墨以为蛇龙之蒞也。后贤承而不废者,江河导而其势不容复遏也。经学不专家,而文集有经义;史学不专家,而文集有传记;立言不专家,而文集有论辨。后世之文集,舍经义与传记、论辨三体,其余莫非辞章之属

也。而辞章实备于战国,承其流而代变其体制焉。”(《文史通义·诗教上》)战国诸子既能各得儒道之一端,如纵横家之流,又能传儒家委婉善讽之《诗》教,后世之文,无论文、质,其体自然可以说是“皆备于战国”了。章氏对后世文体变迁与儒家经典之间的联系以及战国之文地位的论述,可谓精到。

不过,在我们今天看来,中国古代的文体产生于古代的社会生活之中,而非源出于“五经”。比如诗歌,就源于远古时代宗族祭祀活动中巫覡的歌吟祝颂。从传说是神农时代蜡月祭神的祝辞中,从葛天氏时代的载歌载舞的祭神活动中,从舜与夔和皋陶讨论音乐、讨论政事的言谈中,我们今天仍能依稀看到这些歌吟祝颂的情景和面貌,看到其特定的社会、政治功用。再像汉大赋,则直接源于战国时期士人的游说进谏之辞。因为在一些重要的政治和外交场合中,公卿士大夫们仅仅是像春秋时期那样,依靠赋《诗》或作隐语来讽谏君王或应对诸侯,已不足以准确而又充分地表达其情志了。其他像诏诰册命、章表书记、对策奏议、记传论说、碑志铭诔等等,也无不是用以“通上下、亲疏、远近”的结果,是一定社会、政治生活的产物。

中国古代文体的产生既然离不开特定的时代和社会生活,文体的内涵又相当丰富,那么,对中国古代文体的研究,当然应该是放在更为宽广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之下,并可以从多种角度进行。诗海君的《汉魏六朝文体与文化研究》,正是循着这一思路进行探索的成果。

他从汉代的文吏制度讨论汉代应用文体的发达,从汉魏之际儒学的社会地位与作用探讨建安体的形成,从魏晋南朝清谈活动中的审美意趣谈六朝体和文学创作唯美之风的盛行,从文学集团的活跃来认识公宴、咏物、赠答和边塞诗的繁兴,从南朝统治者的出身考论民间俗乐在上层社会的传播和接受,从察举考试的复兴揭示齐梁之际吏事活动对文学创作中用典之风和文体新变的影响,等等。凡所论述,都能将具体的文体学问题置于一时代之政治制度、思想学术和社会风尚等广阔的文化背景下加以讨论,故视野开阔,识见闳通,而又往往深中肯綮。

诗海是2001年来南京大学随我攻读博士学位的。他性格沉稳细致,做事认真干练,在同门中俨然是一位兄长;而他的好学深思,勤奋刻苦,在同学中也是非常出名的。在南大读古代文学专业博士学位,学习任务很重。学生进校以后,不但要修完系里规定的学分,而且还要按导师的要求,研读一些本专业的的基本典籍,并分别写出学术论文。我至今还记得诗海初来南大时那种如饥似渴的学习情形,记得他除了按要求完成有关课程和典籍的研读之外,还坚持去听我给硕士生开的课程时每次坐在教室后面的情景。

诗海博士毕业后,入中山大学从吴承学先生进行博士后研究工作,两年后又留校任教。在吴先生的指导下,诗海辛勤耕耘于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领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部书稿是他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完成的,只要读读书稿中他新增加的章节和内容,就可以看出他的这种进步了。

学术界对中国古代文体学的研究,近年虽已取得了突出的成绩,然可以拓展的空间仍很大。我们虽不同意“五经”为后世文章之源的看法,然儒家经典对文体发展的影响却不能小觑。南朝齐张融曾提出:“夫文岂有常体,但以有体为常,政当使常有其体。”(《门律自序》)在文体的变迁中,“常”与“变”的关系究竟应如何把握,似可作进一步思考。唐宋人论文,“常先体制而后文之工拙”(黄庭坚《书王元之〈竹楼记〉后》),文体自身的规定性又怎样影响了文学创作的发展等等,这些问题也都有研究的价值。因此,以诗海之敬业和勤奋,处大有为之时,将来一定会取得更大的成绩。

是为序。

巩本栋

庚寅夏于水木秦淮

目 录

序	巩本栋 (1)
绪 论	(1)
第一章 两汉文体繁荣与文体学之兴起	(7)
第一节 两汉文体之繁荣	(8)
第二节 《汉书·艺文志》的文体论和文体分类	(14)
第三节 汉代的赋体观	(21)
第四节 汉代经学中的文体研究	(27)
第五节 汉代字书中的文体语义和语源学研究	(35)
第六节 《独断》与子书中的文体研究	(40)
第二章 汉末儒学与建安体	(46)
第一节 曹操的政治方略与儒学思想	(47)
第二节 关于唯才是举	(55)
第三节 汉末儒学与建安文士的学术背景	(61)
第四节 建安时期的文学观	(69)
第五节 儒学思想与建安体	(77)
第三章 清谈与六朝体	(90)
第一节 关于六朝体	(91)
第二节 清谈与逞辞之风	(97)
第三节 清谈与丽藻	(104)
第四节 清谈与声律	(111)
第五节 清谈与俳谐体	(123)

第四章 文学集团与文体开拓	(134)
第一节 汉魏六朝文学集团发展概述	(134)
第二节 文学集团与公宴诗	(139)
第三节 文学集团与咏物体	(144)
第四节 文学集团与赠答诗	(154)
第五节 文学集团与边塞诗	(160)
第六节 文学集团与永明新体诗篇制的确立	(168)
第七节 文学集团与文体风貌	(177)
第五章 南朝乐府民歌的接受传播与雅俗文学的交融	(195)
第一节 宋齐宫廷的市井情结	(195)
第二节 统治阶层的经商风气	(199)
第三节 贵族门生与寒人兴起	(207)
第四节 皇室的出身与吴声西曲的接受和传播	(215)
第五节 雅俗合流与永明新体诗	(228)
第六章 齐梁文人隶事	(236)
第一节 齐梁隶事风气	(236)
第二节 学术主流弱化与博学之风	(241)
第三节 史学繁荣与博学之风	(251)
第四节 隶事与策试	(260)
第五节 隶事与用典	(269)
结束语	(279)
主要参考书目	(284)
后 记	(292)

绪 论

汉魏六朝,是学术史上通常所谓的中古时期。汉王朝完成了政治、思想、文化的统一,奠定了数千年封建文化的基本格局。汉代文学也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并在文学观念、审美风尚、文体样式等方面,为后世树立了典范。然而,从汉末开始,历经魏晋南北朝,中国社会由统一走向分裂,不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思想文化,都处于大动荡、大变革的时期。就文学领域而言,与前代相比,也有鲜明的个性,充分显示了这一历史时期的特点。这种特点至少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创作上主张缘情,二是语言上追求丽藻,三是文学史观上提倡新变,四是注重区分文体,五是文学集团活跃。这些文学思潮的产生,有文学发展内部规律的作用,也有文学之外的原因。因为任何时代的文学,都非单纯的文学现象,而是和一个时代的政治制度、经济生活、学术思想、社会风俗、士人心态等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最早对这种关系作出全面阐述的,是南朝的刘勰。他在《文心雕龙·时序》篇中提出“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的著名论断,代表了古代学者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所达到的高度。

然而,历史总是在曲折反复中前进,文学研究也是如此。在某些时期,人们只注重解读文本,着力于作品的主题类型、思想蕴涵、风格意境、表现手法、语言色彩等方面的探讨,认为除此之外的一切工作,都是非文学的研究。在另一些时候,人们又过于关注背景研究,忽视了文学自身的存在,或者把社会状况仅仅作外部因素附加在作家、作品上,得出一些空泛的,似是而非的结论。这两种倾向,显然都走了极端,是不利于学术的发展和进步的。孤立地研究文学,许多错综复杂的文学现象无法得到

合理的解释。因此,应当研究一个时期的文化背景及由此产生的一个时代的总体精神状态,研究在这样一种综合的历史文化趋向中,怎样形成作家、士人的生活情趣和心理境界,从而产生一个时代、一个群体及个人特有的审美体验和艺术心态。当然,关注文学与其他社会意识形态的亲缘关系,不是使文学消隐,而是要探索文学在总的历史文化环境中怎样显示出其特色,从而使文学作为主体更加突出。余英时在《清代思想史的一个新解释》中指出:

现在西方研究 intellectual 或 history of ideas,有很多种看法。其中有一个最重要的观念,就是把思想史本身看作有生命的、有传统的。这个生命、这个传统的成长并不是完全仰赖于外在刺激的,因此单纯地用外缘来解释思想史是不完备的。同样的外缘条件、同样的政治压迫、同样的经济背景,在不同的思想史传统中可以产生不同的后果,得到不同的反应。所以在外缘之外,我们还特别要讲到思想史的内在发展。我称之为内在的理路(inner logic),也就是每一个特定的思想传统本身都有一套问题,需要不断地解决;这些问题,有的暂时解决了;有的没有解决;有的当时重要,后来不重要,而且旧问题又衍生新问题,如此流传不已。这中间是有线索条理可寻的。^①

尽管余先生所论是思想史研究,但完全适用于文学研究。政治、经济、思想、学术、社会风俗等,是文学产生的土壤、背景,或者说外缘,研究这些背景,对于理解为何产生这样的文学,是非常必要的。然而,文学的发展,又有文学自身的传统和规律,即内在理路。文学研究的最终目的,是认识、理解和把握这种规律,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外缘研究上,否则,就丧失了文学自身的独特价值,而成为政治学、哲学、历史学、社会学等的附庸了。因此,我们强调,文化背景的研究,一定要从文学出发,最后又回到文学上来。

正是基于这种学术理念,本书选择以文体为基点,来考察汉魏六朝文

① 余英时:《戴震与章学诚》,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325页。

学。因为文学体裁及其体式规范是文学区别于其他学科的最本质要素之一。一部中国文学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各种文体产生、发展、衍变的历史,文体批评也因此成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重要内容和基本方法。当然,在中国古代文学和古代文学批评语境中,“体”、“文体”除了体裁、体式这一基本含义外,还有更丰富的内容。^①其中最常见的,有如下数端:

(一) 语言特征。刘祁《归潜志》卷一二:“文章各有体,本不可相犯欺。故古文不宜蹈袭前人成语,当以奇异自强。四六宜用前人成语,复不宜生涩求异。如散文不宜用诗家语,诗句不宜用散文言,律赋不宜犯散文言,散文不犯律赋语,皆判然各异。如杂用之,非惟失体,且梗目难通。”这里的“文章各有体”,指各有不同的语言体系及特征。文体学史上著名的文笔之辨、骈散之争,也是以语言形式特征作为讨论的出发点的。

(二) 体制结构及其表现形式。《文心雕龙·附会》:“夫才量学文,宜正体制,必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然后品藻玄黄,摘振金玉,献可替否,以裁厥中。”刘勰以人体为喻,说明文体是由情志、事义、辞采、宫商四部分构成的有机整体。这里的体制,指文章的构成要素及组织方式。

(三) 体要、大体。《文心雕龙·奏启》:“是以立范运衡,宜明体要,必使理有典刑,辞有风轨,总法家之式,秉儒家之文,不畏强御,气流墨中,无纵诡随,声动简外,乃称绝席之雄,直方之举耳。”《文心雕龙·诠赋》:“原夫登高之旨,盖睹物兴情。情以物兴,故义以明雅;物以情观,故词必巧丽。丽词雅义,符采相胜,如组织之品朱紫,画绘之著玄黄,文虽新而有质,色虽糅而有本,此立赋之大体也。”这里的“体要”、“大体”均指写好各体文章的基本要求或准则,很多时候,又称“大要”、“大略”等。

(四) 体貌、风格。钟嵘《诗品》评张协“文体华净,少病累”,评张华“其体华艳,兴托不奇”,《文心雕龙·体性》:“若总其归途,则数穷八体:

^① 详参王运熙《中国古代文论中的“体”》,见《当代学者文库·王运熙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吴承学、沙红兵《中国古代文体学学科论纲》,《文学遗产》2005年第1期。

一曰典雅,二曰远奥,三曰精约,四曰显附,五曰繁缛,六曰壮丽,七曰新奇,八曰轻靡。”这里的“体”或“文体”都指体貌、风格特征。由于在传统文论中,体裁论和风格论总是紧密关联,因此,用“体”或“文体”指称体貌、风格是非常普遍的。且这一层含义下,又可分为若干小类:1. 某一种或一类文体的风格。如曹丕《典论·论文》:“文非一体,鲜能备善。”“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胡应麟《诗薮·外编》卷一:“诗与文体迥然不类,文尚典实,诗尚清空。”2. 具体作家的风格特征。如《梁书·文学上·吴均传》:“均文体清拔,有古气,好事者或学之,谓为吴均体。”《旧唐书·上官仪传》:“工于五言诗,好以绮错婉媚为本。仪既显贵,故当时多有效其体者,时人谓为上官体。”严羽《沧浪诗话·诗体》有苏李体、曹刘体、陶体、谢体、徐庾体、沈宋体、东坡体、山谷体、诚斋体等。3. 时代风貌特征。如《文心雕龙·时序》:“正始余风,篇体清澹。”钟嵘《诗品·上》:“古诗眇邈,人世难详。推其文体,固是炎汉之制,非衰周之倡也。”《沧浪诗话·诗体》有建安体、黄初体、正始体、太康体、元嘉体、永明体、盛唐体、元和体等。4. 流派风貌特征。如《文心雕龙·明诗》:“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梁书·徐摛传》:“摛文体既别,春坊尽学之,宫体之号,自斯而起。”文学史上又有选体、玉台体、西昆体等,都近于流派风貌。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的文体范畴,是多层次、多内涵的,各层面之间,往往互相补充,彼此融合,而非各自孤立、泾渭分明。有时候,甚至同一指称即包含了多种意义。如永明体,既指体裁形式上讲究对偶、声律的新体诗,又指永明时期的总体诗歌风貌,同时还指永明文学思潮流派特征。这种现象的产生,是由文体概念自身的复杂性决定的。任何一篇文学作品,总属于一定的体类,有一定的形式结构、写作规范和要求,并表现出一定的体貌特征。之所以要区分,是为了论述的方便,在不同场合,强调的重点有所不同而已。本书所谈文体,正是基于这种产生于传统文化土壤中,内涵丰富、复杂的范畴,而非西方文学批评那样单指体裁、体式意义。这一点是必须加以说明和强调的。

文体以语言为工具,但并非仅为语言现象。文体的形式选择与审美特征,总是与特定的时代精神、社会风尚紧密相关,体现了这一时代士人感知世界、阐释世界、表现世界的特殊方式,因而具有深广的文化学内涵。这是本书以文体为基点,同时又从文化视角切入研究的主要原因。当然,从广泛的文化背景来观照汉魏六朝时期的文学发展,是学术界业已深耕熟耘的课题,现有成果颇为繁富。如刘师培、黄侃、陈寅恪、王国维、鲁迅、王瑶诸先生的研究,都达到了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度。因此,本书不拟对这一课题作面面俱到的论述,而只是就视野所及的若干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如两汉文学,一般只重视辞赋、史传文、乐府、文人五言诗等研究。其实,汉代文章体类大备,推动了文体研究和文体学的产生,这是意义重大而学界较少关注的问题。又如,建安文学的繁荣,一般都认为是儒学衰微,礼教动摇和人性觉醒的产物。其实,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如果全面审视这一时期的文学,则不难发现,建安文士的文艺观,基本上继承了儒家传统。文学史上盛称的“建安体”或“建安风骨”的形成,更是以原始儒家思想为精神底蕴的。对于这一点,学界的认识似乎有所不足。又如,清谈无疑是魏晋六朝最重要的文化现象,对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影响。具体到文学上,一般只注意玄学义理对文学理论和创作的影响,而较少关注清谈活动自身与文学发展的关系。再如,吴声西曲在南朝上层社会的普遍接受和传播,通常都认为是魏晋以来老庄思想流行,士人沉溺于声色享受的结果。这种观点即使有合理性,也是非常片面的。在一个士族阶层统治文化的社会里,民间俗乐和俗文学能蓬勃兴起,并为整个统治阶层接受和欣赏,有其政治、经济上的必然性。又如,齐梁时期,文士之间盛行隶事游戏,有些学者模糊地感觉到了这种文化风习与创作中使事用典的关系。然而,为何齐梁之际会风行这种游戏,这种游戏又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当时的文学创作与文体风貌,都缺乏具体的研究。再如,汉魏六朝文学集团兴盛,推动了文学和学术文化的发展。可是具体到集体文学活动如何影响文学创作,往往语焉不详;即使有,也多否定性的评价,如应酬帮闲、无病呻吟、面貌雷同等。其实,集体文学活动固然难